

张安惠 ● 著

钟爱我一生

从大小姐到女大学生 从女大学生到高干夫人

从高干夫人到高级记者

作家出版社



张安惠 ● 著

钟爱我一生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钟爱我一生/张安惠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7

ISBN 7-5063-2402-4

I. 钟… II. 张… III. 张安惠-自传 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1319 号

钟爱我一生

作者: 张安惠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李颖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402-4/I·2386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写在前面的话

时光倒回去 60 年，那个雨霏霏雾濛濛的冬日，长江上缓行的一个划子上，坐着一个 13 岁的小姑娘，抽抽搭搭地啜泣不止。她的母亲自戕身亡才 14 天，父亲又跟着病亡。一所“下江人”办的流亡学校收留了她。抗战胜利流亡学校解散时，她进了大学。为了几个无依无靠的弟弟妹妹，花样的年华她拒不谈爱，后来由党组织作媒，嫁给了一个正直的老干部，不惑之年丈夫又被康生迫害致死。

这个孤女就是我，现在已是一个 73 岁的老妪。一次次交厄运，凄惻又悲惨，幸而我的老师、同学、同志、朋友、丈夫和亲属给我灿烂的笑脸。有他们的呵护，“花落春犹在”，我才咽下悲酸的泪，站立起来，快乐地活到了今天。我可以没有钱、没有名誉地位，但不能没有他们给予我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他们的“情”，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精神力量。

历尽艰辛，如今我赶上了充满希望的新时代，但已快要到达夕阳衔山的岁月。我有一个讲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，60年中许多令人感动、令人难忘的人和事，不断涌上心头、涌到我的笔尖。本书涉及的人有三四十个以及与之相关的真实的细节。书中的叙事编织在时代、社会的经纬线中，镶嵌出时代和社会的一道道风景，而非沉溺于私人化的记事。

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自小失去依靠，求学上进，为的是吃饭穿衣，在社会上求得立锥之地。与此同时接受的儒学教育，告诫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不做见利忘义的小人。君子与小人之辨形成我的道德规范，宁可守穷而不移其志。及至成年与老革命干部结合，他讲的是奉献，千百万同他一样的有志青年，出生入死，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。我的道德观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，我亦步亦趋自认为是一个后进者。但世界再一次变化了。眼下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经济腾飞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以令世界吃惊的增长率在猛进。在市场经济只分强者和弱者，功利是惟一的标准面前，传统的君子小人以及无私奉献的价值观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受利益驱动而发生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地令人吃惊。许多普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。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落差如此之大。我个人以为，不妨以精神的追求为主，视之为身内之物；以物质的追求为次，

视之为身外之物。人对于名利的追求往往是无止境的。对金钱和名利的追求没有制约，就会被套上名缰利索。人生在世，把精神需求置于物质需求之上，是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。追求内心的充实与快乐，注重净化自己的心灵，是真正的幸福。青少年时代，我在四川合江流杯池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，物质极度匮乏，我深深体验到一个人实际上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并不多，只要不贪婪，简朴的生活可以过得很自由、很快乐；为求物质而一味去奴役自己，并不自由快乐。超越虚名浮利作超越自我的追求，又有美好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那才不致枉度一生。

2001. 11. 10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 / 1

第一部

第一章 变故 / 3

第二章 上大学 / 67

第二部

第一章 解放 / 115

第二章 晋京 / 1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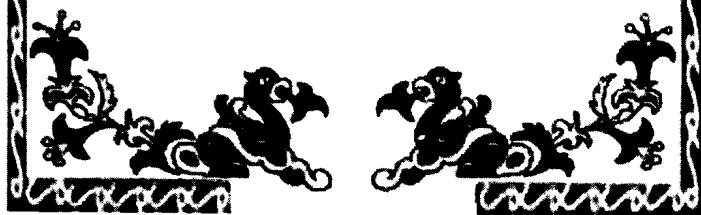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风浪 / 192

第三部

第一章 人生境界 / 221

第二章 退休以后 / 238

第一部



原书空白页

第一章 变故

1. “下江人”的学校

我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，裹过足又放足，虽然没有变成像粽子一样的小脚，毕竟是一双不入时的改组派的脚。父亲做了县官以后，她依然不在公众场合露面。

我的大姑比母亲小两岁，没有裹足，二姑、三姑也都没有裹足。母亲的娘家有些产业，是个破落的大户人家，老规矩多，到了民国，还给母亲裹足。张家几代人无任何不动产，生活、礼仪都不那么守旧，几个姑姑不仅没裹足，还进洋学堂念过书。母亲嫁到张家，在姑子们面前，旧时女人一个，抬不起头，凡事让她们三分。

父亲却一点也不嫌弃母亲。从外面回到家，见不到母亲，就要唤二太太、二太太，将母亲从厨房或后院叫到跟前，母亲的“跟屁虫儿”弟弟和妹妹也随之而到。父亲抱起他的娃儿亲一亲，同母亲打个照面、说几句话，才去干自己的事。“跟屁虫儿”这个词是父亲最先叫出来的，他很爱母

亲为他生的几个“跟屁虫儿”，以及母亲。

父亲很恋家，同母亲耳鬓厮磨，形影不离。一天，他拿回一张请帖，要母亲单独去参加一个典礼。母亲以为父亲又在同她开玩笑，没答理。可这次父亲是认真的，说道：“是惠娃的学校送来的请帖，我没有空，你去一趟，看看那所学校究竟如何。”父亲也是有意让母亲出去见见世面。

母亲一听说要她去看看我即将入学的学校，迟疑片刻，一反常态地说：“我去。”父亲怕母亲是一时冲动，过一会儿又反悔，故意逗她说道：“学校离县城很远啊，那边又都是些你没见过的‘下江人’啊。”故意将两个“啊”字拖得长长的，好让母亲再想一想。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说去，就一定会去。”

这是母亲第一次、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家门到外面参加活动。她是为了我。

母亲要出门，身边的“跟屁虫儿”怎么办？父亲的意思是将娃儿们留在家里，由女佣刘嫂看着。母亲却说大一点的两个娃儿留在家可以，才一岁半的小弟弟毛猪（乳名）是个“粘粘”，整天粘贴着她寸步不离，她不在，小弟弟会哭喊。母亲不忍心，自己累就累点，那天早起抱着小弟弟走出家门，奔我的学校而去。

大约下午三四点钟，阳光还亮亮地照着纸糊的窗棂子，我在屋里隐隐约约地听见母亲和弟弟的声音，他们也该回来了。跑出房门一看，果然是他们。母亲的脚一瘸一瘸的，弟弟不肯走，要母亲抱。我瞪大了眼睛问：“妈妈，你的脚怎么了？”母亲答道：“不小心，脚跟踩到石板路的罅隙，崴了一下。”我赶紧把小弟弟抱过来，喊刘嫂过来将母亲迎回客堂坐下。

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母亲一面拍着小弟弟睡觉，一面同我

叙说那所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。

我要进的那所学校，是抗日烽火中，为从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四川的流亡学生设置的学校，最初叫第五中山班，1941 年秋我插班入学时，调整为国立第十六中学女生部。从第五中山班起，她一直是直属于当时的中央教育部，校长和老师都是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“下江人”。

这所学校离合江县城 10 余华里，是在靠近长江边一座叫榕山的半山腰一块平地上。在一排老屋的后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深处，有从山石间流下来的清泉，一丝丝、一滴滴汇入一个大的蓄水池。母亲来到这里，只见山是碧绿碧绿的，蓄水池的水也是碧绿碧绿的。有人告诉她，全校师生饮用的就是这山泉水。

蓄水池不远处的岩石下，还有四四方方的一块石坪，上面刻有“天下奇观”字样的水槽，清泉流入水槽，据说有些骚人墨客在水槽内放一只酒杯，酒杯顺泉水而流动，曲折向前，最后停留在站立于“天下奇观”四个大字旁谁人的面前，谁就吟诗一首饮酒一杯。有人向母亲介绍，这里因此而叫流杯池。

母亲那天到学校，是参加该校由中山班转为国立第十六中学女生部的庆典。来宾们先参观教室，再到作为学生寝室的几个院落看看，又转到后山的竹林，一路看去，到处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

母亲走进学生寝室，她看到室内除了一排排双层床外，墙上还整齐地挂着一长排蓝色的长方形布袋，上面用醒目的白线绣着学生的学号，房间过道和床底下，皆空无一物。学生进寝室就是睡觉，或从绣有自己学号的蓝布袋，取、放零碎东西。

学生的书本、文具都放在教室内的课桌里，整个白天和

晚上九点以前，学生都在教室上课或自习，很少到寝室来。学生的大件物品如箱子、被子等等，则放在指定的储藏室内。一位专管学生生活、寝容及卫生的女老师，学生管她叫“寝监”，兼管储藏室。她手里有一大串各寝室及储藏室房间的钥匙，到了开放的钟点，准时开放。

学生早起盥洗用的脸盆、毛巾、牙具，都整齐地放在寝室外走廊的木架上。

母亲还被领进参观展示学生学习成绩的陈列室，但她对陈列室的学生作业难得仔细地看，身边带着一个小娃娃，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只是在陈列室里站一会儿就出来了，而对于学生寝室、盥洗室等生活设施和管理，则十分留意。她原以为这是一所收容从“下江”逃来的难民的学校，所以要亲自来看看。实地看了以后，她感觉这是一个文明的地方，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。她没想到那些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果真比合江县的中学办得好。

父亲回来时，饭菜已端上桌，只等他吃晚饭了。父亲问母亲到学校观感如何？母亲一面吃、一面说，说的都是对学校称心满意的话。二姑是重庆文德女中的毕业生，她问：“有文德女中好吗？”这可把母亲问住了，文德女中如何，母亲没去过，没法比较。要说比文德女中好，会伤了二姑。父亲察言观色，不等母亲说话，抢嘴说道：“我看中的学校哪还有错，你们还不晓得吧，从‘下江’搬来了国立武汉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交通大学，考上这些大学的，大部分是合川的国立二中、江津的国立九中、永川的国立十六中等一批国立中学的学生，惠娃子将来还有可能进国立大学。”

父亲说话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咳嗽，有些吃力。母亲望着我说道：“惠娃子，听见爸爸的话没有，要好好念书，将来还可能念大学哩。”母亲为我准备卧具等生活用品时，又

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并且说这个学校不收本地人，要进去还不容易呢。

那两天，母亲满脑子都是学校，她第一次出去见世面，什么都新鲜。她又想起来了，对我说道：“那学校有一股子‘洋味’咧，放的音乐是洋歌，卡米、卡米，听也听不懂。一支用中文唱的歌是什么最后一枝玫瑰。”母亲从留声机里听惯了当时流行的《毛毛雨》：毛毛雨，下个不停，微风，吹个不停，哎呀呀，我的小亲亲……等粗俗的歌曲，没听过抒情的《老黑奴(OLD BLACK JOE)》、《最后一枝玫瑰》。我入学后，才知道美国黑人唱《老黑奴》中的卡米、卡米，是I AM COMING, I AM COMING。《最后一枝玫瑰》是带一点忧伤的爱尔兰民歌。两张唱片都是校长从苏州带到四川的。

入学那天，父亲唤刘兴发送我到学校。刘兴发是我母亲一年前从安岳县带到合江的勤杂工，离安岳时，母亲同意他的女人刘嫂也同行。到了合江，刘兴发在县政府当“听差”。喊一声“听差”，不呼姓名，他就会答应“有”，听差就是等着差事。听差不只一个，所以不呼姓名。刘嫂在我家做女佣。

忠实可靠的刘兴发拎着我的行李，领我走到河坝头，雇了一只划子(小木船)，船夫慢慢地向江心划去。划子离岸，从江上望合江县城，整个县城立于一座山上，鳞次栉比的房屋像是用木棍支撑着，险象环生。春天发大水，长江水夹带泥沙泛红色，此刻是秋天，已进入枯水季节，清凌凌的长江水缓缓地向东流去。划子划到江心赤水与长江汇合的地方，水流湍急，卷起白白的浪花，江水流速骤然加快，冲得划子上下颠簸。那船夫一只手把舵，一只手划桨，就那么几下，划子划过湍流，平静地落在缓缓的江水中继续前行，不一会

儿便停靠在流杯池江边。若遇上一个不识水性的船夫，也可能翻船。一年之中，总有那么一二次，尤其是春夏期间的洪水季节，坐划子可能遇险。

我们从划子跳上岸，走了一程石径小路，再气喘吁吁地爬两架陡坡，回望江边，那划子变成一个小点儿、几乎瞅不见。眺望对岸，青山缭绕，不见人烟。近处则茂林修竹，高大的榕树遮天蔽日。这儿的景致县城无法与之相比，我立即想到母亲那日到校，是否欣赏了这儿的风景？这儿山路难行，又没有挑夫和滑竿，她一双小脚，又抱着小弟弟，多么艰难才爬得上来啊！

再往前行，是一段平坦的石板路，两旁有梯田，刘兴发指着远处隐隐约约藏在树林中的一片老瓦屋说：“看，那肯定是‘下江人’的学校啦。”

没走到校门口，我便对刘兴发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我心里想的是，不能像个大小姐一样出现在老师同学面前。我拎着过去从没有拎过的笨重行李，独自走到学校。

学校没有设门卫。一条笔直的不太宽的乡间土路，延伸到一架石坎坡前。土路左边有个很大的操场，操场边有茅草盖顶的一间间教室；土路右边有个花圃，花圃旁也有几幢茅草屋，其中较精致的一幢是教务处。这一片教学区，想象原来是一片田地，数年前兴办学校时，才在这儿平操场，建茅屋课堂。

从操场尽头的石坎坡拾级而上，进入二道校门。里面有石板铺的一个小广场、有影壁。第一进，两边各有一幢高大的瓦房；再上几级台阶，第二进，左右都有几重院落、几个天井，庭院有廊、有郁郁葱葱的常青树。院中还有一口水井，井旁有一株桂花树，散发出扑鼻的幽香。这几个小院落大大小小的房子是学生的寝室。在昆明的西南联大(抗战前

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大学)女生宿舍，原是一座祠堂，女生们就睡在尘封的神主牌位之间，比起西南联大女生的住宿条件，我们要好多了。想象龚慕兰校长在四川合江找到流杯池这个地址很不容易，它很像北京潭柘寺那样清幽静雅，但不是一座庙宇，而是文人墨客吟诗饮酒的地方。第三进，为正房，有客堂和宽敞的走廊，房后是后山和流杯池。校长和女老师们住在正房客堂两边的屋子，客堂是我们的音乐教室。后山上有一排茅草屋，那是男老师的宿舍。山上还有一个锅炉房烧开水、热水。下午三四点钟上完课，锅炉房便放热水供同学们洗用，那一桶桶热水通过从山上架设到二重院落的竹筒管道，流到学生寝室天井旁一个很大很大的木桶里。学校很讲清洁卫生，又都是些女孩儿，热水是不可少的。

我到校后，有位同学帮助我找到了校长龚慕兰。只见她约40来岁，清秀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高高的个子，白皙的皮肤，穿一身我少见的上衣和裙子。那同学将我领到以后，并不走开，站在一旁看看校长、又看看我。我敬畏校长，很紧张。还好，校长问清楚我是插入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后，便对那位同学说：“你认识夏兰英吗？叫她来一下。”

夏兰英很快就到了。校长把我介绍给她，要她领我去办入学手续。兰英领我去教务处报到，然后在教室找到座位、寝室找到床位。她讲一口甜糯的苏州话，飞快，听起来很婉转，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此后，我不去找她，她也懒得来找我，我们没有成为要好的朋友。班上的湖北籍同学最多，同她们相处没有语言障碍，东北、华北的同学也没有语言障碍，但我在班上没有朋友。谁能跟我一样，周末就回家；县长小姐，养尊处优，多个别呀。

初到学校，我对同学“认生”，同学看我“特别”，彼此格格不入。

父母亲认为这所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很好，但我却觉不出它的好来。早晨吹起床哨10分钟后，就要从二重院跑到大操场去晨炼，体育课老师总是提前在操场等我们，一到齐，她就吹哨，喊一二一，领我们跑步、锻炼。冬日晨炼时，天未明，老师不点名，若趁机恋床多睡一会，不去跑步锻炼，那“寝监”女士查房立马会发现你，体育老师、训育老师也很快就知道你违规。上课更是不能迟到早退。学校对我们管得很严，我心里很不自在。

还有，课余时无论在哪里，都不许高声喧哗，或放声哈哈大笑；走路时不许吃东西，更不许边吃边吐、随地吐痰；坐在凳子上两只脚不许高高跷起、或跷二郎腿、或随意蹬在椅背上、墙上。这些细微末节的小事，校长和训导主任刘忆萱都看作是有关一个学生、一个学校的仪表仪容、校风校纪的大事。她们在讲话时，不止一次说道：“来学校受教育，要文明礼貌，走出学校，人家一看，上过学校的学生就是不一样，站有站样，坐有坐样。”

校长每天都要在学校四周转几圈，她的两只手背在身后闲步，看似悠闲的样子。遇有学生仪表仪容欠差，不吆喝、不咋呼，只是眼睛望着你，说一声多不美观呀！既没伤你的面子，你也就心悦诚服地改正。

我受了学校的熏陶，渐渐地改变了大小姐的一些坏习惯。校长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留美归来，在苏州办学，任苏州女师校长；抗战后到大后方办流亡学校，仍沿袭着培养为人师表的教师的尺度来培养学生。

校长每天在学校转呀，转呀！哪个课堂教学秩序好，教员完全吸引住了学生的注意力，她心里会一清二楚。尤其是那一池清澈的山泉水，校长来回转悠，谁也不敢到那儿去打水洗涤衣物。